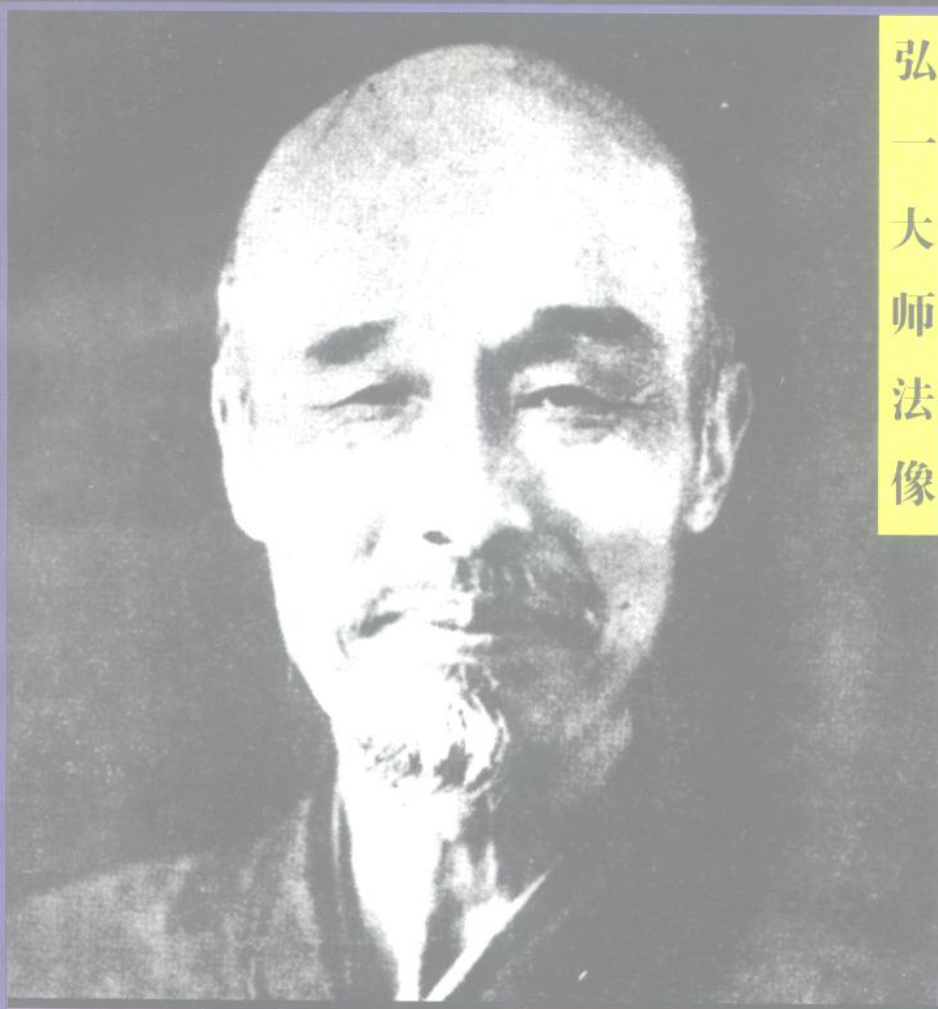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师法像



弘一
法师
年谱

林子青 编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高僧年谱系列

V124/24
弘一法师年谱

林子青 编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京)新登字 3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弘一法师年谱/林子青编者.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9

ISBN 7-80123-009-4

I. 弘… II. 林… III. 弘一—年谱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124 号

弘一法师年谱 林子青 编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沙子口路 7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30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责任编辑:史平 封面设计:杨群

ISBN 7-80123-009-4/K·5

定价:15.00 元



1918年弘一大師在入山修梵行之前，與學生劉質平(左)豐子愷(右)合影。時為1918年4月15日，大師39歲。



1920年9月,弘一大师初出家时,在杭州西湖玉泉寺留影。



1942年10月13日(农历9月初4日),大师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右肋而卧,临终之瑞相!“悲欣交集”(下),在入灭前,写交待者妙莲法师。这是最后遗墨。

悲欣
交集

世法惟忍

下濃出世法

惟忍下沒

弘一

以戒為師

敬贈晉江月臺佛學社庚午冬筆
品行未幾各志存以戒為師一書

佛光

証無上法究竟清涼

華嚴經句 庚午六月廿日

官勤精進

庚午二月 高壽

但念無常

一理

弘一法師手書“以戒為師”、“佛光”等墨迹。

出版说明

中国近现代佛教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研究中国佛教的近现代史,最好的办法也是最为实际的需要,就是出版一套“中国近现代高僧年谱系列”。了解了近现代高僧的生平历史和思想演变,就可以理出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的活动脉络与发展轨迹,从而为中国佛教的研究提供线索和历史根据。不印传记而印行年谱,这不仅因为年谱是真实生活的记录,语皆有据,详尽无遗,是传记的最佳素材;而且它能把对谱主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省掉许多考证和检索的麻烦,直接获得第一手材料。

我们首批推出《虚云法师年谱》(岑学吕编)、《太虚法师年谱》(释印顺编)和《弘一法师年谱》(林子青编),还计划出版《圆瑛法师年谱》、《印光法师年谱》等等。我们希望这套年谱系列的出版能够促进史学界与佛学界编写出更多的佛教高僧及居士、学者的年谱来。

自序

拙著《弘一大师年谱》，自一九四四年在上海出版至今，历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当时烽火弥天，交通梗阻，征集资料，至为困难。我竭年余之力，从搜集到的有关弘一大师各种资料，摘录整理，考证抉剔，约得十四、五万字。限于当时客观条件，内容简陋，许多时期的事迹都是空白，插图版面亦多欠明晰，实在是很不成熟的作品。

我写年谱的动机和目的，在初版的前序后记已经有所说明。因为大师于一九四二年在福建泉州圆寂以后，各地佛教报刊杂志的纪念文章很多，一般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叙述一些回忆的印象，都不免偏于一时一地的记载，想凭这些互有出入的记载去了解大师的一生是不够的。于是写作一部线索分明的年谱，让读者可以看出大师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这个念头就在我的脑里萌生起来了。这可说是我最初的动机。

出版以后，有位读者写了一篇《读弘一大师年谱》的文章，发表于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二日），他是很能理解我作年谱的苦心的。他的文章说：“年谱是生活的记录，固贵详尽无遗，尤尚语皆有本，真实无讹。这本年谱确能做到这地步。”又说：“弘一大师在世六十三年，从留学生活到教学生活，再到出家生活，其间思想的变迁，生活形态的改变，就好像是一出的戏剧，毫无遗漏

地引证叙述，实在不很容易。”这些话自然是过奖，但也表达一个读者对于此书的评价和看法。

回忆最初搜集资料时，我首先找到了著名作家夏丏尊先生。他是弘一大师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多年的同事和出家后交谊最深的挚友，请他指示写作的方法和提供他所收藏的资料。夏老师那时有病，不能多谈，只表示欢喜赞叹。说着就打开书箱，把他多年所收藏的大师手迹和有关资料，供我任意挑选抄录。

不久我又写信请教和大师谊在师友之间，曾任上海世界书局总编辑的蔡丏因(冠洛)先生，请他指示写作大师年谱应注意哪些方面。他很快回我一封长信说：“子青先生左右：省书有《弘一大师年谱》之撰，甚盛甚盛。大师由儒入佛，又善诗词，其西洋画与音乐，久为艺坛所重。披剃以后，将平日一切辗转熏染之习气，洗涤净尽，独为人书写经偈。盖不仅以书重，严净澹远，如见其人，尤足重也。然大师以弘法为急，人因其书以重法方为不负。年谱之要，在厘其思想变化之迹，判其学术异同之故。涉笔所及，贵实证尤贵识力。实证犹可于函牍中求之，师友见闻中询之；而别异同、审得失，则非有识力不可。”

他最后说：“忆十九年秋(一九三〇年)，余寓绍兴。大师将去闽南，由杭过绍，居戒珠寺。余以师应化事迹，彰彰在人耳目，年远代湮，或不免传闻失实。宜及身勒定年谱，以示后人。师言无过人之行，思之徒滋惭愧。惟自幼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诫之，以为非童幼所宜。其后虎跑出家，内心迫切，若非即时披剃不可者，自亦不

能明其故也。……律学一欲复南山之旧，颇以宋明以来趋于简惰为非。常以一念不专，一行不笃，贻羞法门为惧。迹其所言，与灵岩老人实有不同，明代灵峰大师庶几近之。”（灵岩老人，即苏州灵岩山印光法师；灵峰大师，即浙江北天目山灵峰寺藕益大师）

从蔡丕因的信看来，他是曾请大师于生前自定年谱的。但大师盛德谦光，岂肯自我标榜？终以“平生无过人之行”谢之。

我编的年谱出版后，蔡丕因在上海《觉有情》杂志，先后发表《弘一大师年谱广证》和《弘一大师经籍题记汇编》，并在我送他的《年谱》上写得密密麻麻的有关资料托人转送给我。《广证》和《汇编》虽然只是他个人收藏的部分资料，但这些资料对我增订年谱的工作却有很大的帮助。

《年谱》初版时；大师出家前写的《断食日志》和一九三七年口述、高胜进笔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我尚未见过。许多情况是从蔡丕因的《年谱广证》看到的。

一九四七年，在《觉有情》杂志上看到胡宅梵写的《弘一大师胜缘纪略》文中追记的事迹，足补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年谱的空白。《纪略》大意说：“我是一九二九年秋，在白湖金仙寺由亦幻法师介绍认识大师的。见师气度静穆，慈蔼被人，一见兴感，曾写《见了弘一法师》一文，刊于《现代僧伽》，并和大师在金仙寺同听天台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听经应该是一九三〇年的事——著者。）复允余皈依为弟子，并取法名为‘胜月’。后来我写了一

部《地藏经白话解》，大师曾为我题签和作序。

“一九三一年，栖莲和尚为五磊山住持，请师驻锡，我随师上山。天未明，师已起上大殿，亲击钟磬，导众念佛。其间并与亦幻、文涛、显真、栖莲、慧纯居士等十人，发起求生西方普贤愿，亲制愿文。是年孟冬，师创律学院不成，下山居金仙寺。时有镇海龙山伏龙寺住持诚一法师，请去供养，师命余随往。至则居关房内，我小住即归。龙山风景，兼山海之胜，师从未出关欣赏。值新晴，请师赏领，师不允，盖不耽逸乐也。”

在增订年谱过程中，给我最大帮助的是大师俗侄李圣章（麟玉）先生。一九五六年，我到北京以后，早想前去拜访他，了解一下李家的变迁情况。听说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我就写了一信请政协代转。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约好在他家里见面时，谈了很多话。他说他的祖父名世珍（此名我初次听到），字筱楼，和桐城吴挚甫（汝纶）是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的进士同年。告辞的时候，圣章先生捧出一大堆有关大师在俗的宝贵资料说：“我看过您写的《弘一大师年谱》，很费一番苦心！这些资料对您将来增订年谱时，可能是有用的，请留下作个纪念吧。”

我回家打开一看，完全是我多年想看而找不到的资料，想不到竟会在北京发现！其中最难得的是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十月四日东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哀的《清国人志于洋画》的剪报（此文我已译出，载于《弘一法师纪念集》）。

其次是大师致李圣章的十七通手札真迹和工楷书写

的《晚晴剩语》七纸，对大师出家的经过和志愿及云游踪迹，以及精心撰述的散文传记等，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此外还有大师十八九岁时入天津县学所作的“课艺”（时文）原稿十余篇，足以窥见大师青年时代的学力和思想。

出版的小册有：《唐静岩司马真迹》、《辛丑北征泪墨》（大师早年所作的许多诗词就在此书发见的）、《诗钟汇编初集》、《汉甘林瓦砚题辞》、《法学门经书》（翻译）、《国际私法》（翻译）以及许幻园的《城南草堂笔记》、宋贞（幻园夫人梦仙女士）的《天籁阁四种》等。还有蔡元培手批的“南洋公学作文”一篇。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第三场考卷”封面一纸（内署嘉兴府平湖县监生李广平）。这些作品都是大师留日之前极重要的资料。

关于大师留学日本的记载资料，最初我只看到《上海通志馆期刊》胡怀琛撰的《上海学艺概要》和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略知他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和音乐，并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共同创立“春柳社”演剧团体，演出过《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而已。其他都是空白。

一九五六年我到北京后，偶于友人处看到一本程清著的《丙午日本游记》（程清字白葭，江苏常州人。清末从事新闻工作于山西。一九〇六年奉派赴日考察工艺医学，著有《丙午日本游记》），适有参观“东京美术学校”记事颇详。才知道大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的大概情况。同时看到《国民新闻》的《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导，对于大

师考入美校的时间和学习情况就更清楚了。

近年由于殊胜的因缘，得与日本作家吉田登志子女士通信，涉及大师早年诗作的解释和春柳社的演出问题。我曾介绍战前上海举行的“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会”的杂志纪录给她。而她回报我的是一些登载李叔同参加日本汉诗坛活动的《随鸥集》（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汉诗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等所组织的‘随鸥吟社’机关刊物），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稿》，滨一卫的“关于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一九〇七年《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所载伊原青青园的《清国人的学生剧》，及一九五七年欧阳予倩给中村忠行的信——《欧阳予倩先生的书简》等。这些文章对于大师日本留学时代的演剧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从日本学者研究的资料看来，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博士早就看过拙著的《弘一大师年谱》和收藏它的。滨一卫写的“关于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一文，基本上就是从吉川博士那里借到的《年谱》写成。据滨氏的文章说：“曾孝谷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美术学校毕业（同学会名簿）为止和李岸是同班同学，即自一九〇六年九月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在学的。据当时当这油画科班长直到毕业的山口亮一氏说：这个班里有留学生三人，曾李之外有一印度人拉奥氏。”这和程清的《丙午日本游记》记载相符。《游记》说：“西洋画科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一名曾延年。”同时滨氏还根据美校的“五年制”与一九一一年的毕业纪念照片，订正拙著《年谱》的“一九一〇年毕业归国”为一九一一年毕业之误。

一九五六年中村忠行写的《春柳社逸史稿》，对李岸留学时期的文化活动有更详细的介绍。他说：“春柳社的创立是一九〇六年，其中心人物是曾延年与李岸，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两人都是当时东京美术学校在籍的学生。就李岸说，以年仅二十七岁，早已主编《音乐小杂志》那样早熟的文学青年，留学日本后，似乎不久就努力和日本文化人有所接触。一九〇六年六月，早已加入汉诗人小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所领导的‘随鸥吟社’。七月一日即列席于偕乐园举行的副岛苍海以下十名士的追荐筵，赋诗见志。当时的李叔同最注意的，除专门的绘画与音乐的学习，似乎就是作诗。这时以后，他便常常参与“随鸥吟社”的诗会或听森槐南的李义山诗的讲解，或投诗稿于《随鸥集》，深得主编大久保湘南的称许。同时日本一流的汉诗人们也欢喜和这年轻的中国诗人结交。可见大师留学初期在日本多方面的文化活动。”

最后发现的资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天津日报》登载的“李叔同史料的新发现”，继由天津图书馆高成元撰写发表于《天津史志》（一九九〇年第三期）的《李叔同革新丧礼的事迹》。这两种资料出于同一来源，都是根据一九〇五年天津《大公报》七八月间报导的关于李叔同革新丧礼的记事。

高成元的文章说：“一九〇五年初夏，李叔同的母亲病逝于上海。他挈眷扶柩，归津葬母。”此次居津的活动，是他传记中的一段空白。高成元从当年天津《大公报》上发现了一组珍贵的史料，记载了李叔同革新丧礼安葬亡

母的详情，填补了这一段空白。他说：“在李叔同为他母亲举行丧礼的前六天，《大公报》就在‘本埠新闻’栏中以‘文明丧礼’为题预报说：‘河东（天津河东区）李叔同君，新世界之杰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于本（七）月二十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新仪。’次日《大公报》又公布了新仪的具体内容。除称‘备有西餐，以飧来宾’外，并附有《哀启》说：‘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另定新仪。’”（详情请参阅年谱一九〇五年条）

由于近年“弘一研究热”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小说、散文、随笔的记事，为了迎合群众的某种趣味，便写出了许多虚构的奇谈怪论，甚至把他神化起来，使读者把他当做怪人、超人看待。

例如有人说，大师诞生时，有喜鹊衔松枝降其室，父母视为吉兆，垂髫之年，即将松枝赠作纪念。但据李家后人说，绝未闻有此异事。又一般作者常把“沪学会”与“强学会”相混淆（以上二则均见丁福保《弘一大师文钞序》），其实“强学会”是康有为早年组织的政治性团体，成立于一八九五年（《康南海自编年谱》）；而“沪学会”是个社会教育团体，成立于一九〇四年，性质完全不同（《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穆藕初传》）。有的小说还说大师在留学时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见过孙中山，而且填写了“盟书”，向天宣誓，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现大师革命的思想。其实这些虚构的传说是对大师历史的歪曲。

还有一位作家说：“李叔同曾娶过一位日本夫人。有一天岳母来看女儿，谈了半天，天忽然下起雨来。岳母要借一把伞回去，叔同无论如何不答应。”此事在徐半梅的《话剧初期回忆录》也曾提到，说明其脾气之怪。但大师的老同学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却说：“他的风度一贯很温和很静穆——我看到‘不肯把雨伞借给丈母娘’的记载，有些惊讶。”

大师最怕被人捏造神话，以资宣传。一九三八年初夏，他从厦门避难到漳州，居城东瑞竹岩。志载瑞竹岩的得名，本有一段神话：谓五代时高僧楚熙，结茆于此，剖竹引泉，后竹生笋，因名“瑞竹”。师居瑞竹岩时，闻有枯竹萌芽，好事者为文载于报端，谓系大师莅临瑞应。师闻之急令人辟谣，住数月即离岩而去云。

弘一大师音公圆寂已近五十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他同代已故的高僧大德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大师逝世以后，人们对他的怀念景仰却是与日俱增的。因为大师生前以美术书法驰誉当世，修养高深，行解相应，所谓“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是中国道俗公认的律宗高僧。

弘一大师的出家，一般人都不是很理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他好像都抱一种惋惜的心情。因为他多才多艺，于艺术领域几乎无所不精。有位作家说：“就艺术论艺术，弘一法师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从艺术应有的作用来说，由于他世界观的极度消极，其才华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因此他的后半生和他的整个艺术生命